中国文学编年史

晚清卷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王同舟

湖南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文学编年史

晚清卷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王同舟

中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编年史. 晚清卷 / 陈文新主编；王同舟分册主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9
ISBN 7-5438-4536-9

Ⅰ.中… Ⅱ.①陈…②王… Ⅲ.①文学史—编年史—中国—清后期 Ⅳ.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7660 号

中国文学编年史·晚清卷

责任编辑：李建国　胡如虹　曹有鹏
　　张志红　邓胜文　杨　纯　聂双武
主　　编：陈文新
书名题字：卢中南
装帧设计：陈　新
出　　版：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市场营销：0731-2226732
网　　址：http://www.hnppp.com
邮　　编：410005
制　　作：湖南潇湘出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0731-2229693　2229692
印　　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版　　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 1094　1/16
印　　张：34.5
字　　数：763,000
书　　号：ISBN 7-5438-4536-9/I · 453
定　　价：258.00 元

《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曹道衡　傅璇琮

霍松林

主　编　陈文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观海　李建国　汪春泓　陈文新　张思齐

张玉璞　於可训　赵伯陶　赵逵夫　胡如虹

诸葛忆兵　曹有鹏　熊治祁　熊礼汇　霍有明

本卷撰稿人

王同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国家985建设项目

目 录

总序 …… 1
凡例 …… 1
绪论 …… 1

第一章 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一年(1840—1861)共22年

引言 …… 1
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 庚子) …… 5
公元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辛丑) …… 16
公元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壬寅) …… 28
公元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癸卯) …… 35
公元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甲辰) …… 43
公元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乙巳) …… 52
公元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丙午) …… 59
公元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丁未) …… 66
公元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戊申) …… 72
公元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己酉) …… 78
公元1850年(道光三十年 庚戌) …… 88
公元1851年(咸丰元年 辛亥) …… 95
公元1852年(咸丰二年 壬子) …… 103
公元1853年(咸丰三年 癸丑) …… 10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公元 1854 年（咸丰四年　甲寅）…… 117
公元 1855 年（咸丰五年　乙卯）…… 121
公元 1856 年（咸丰六年　丙辰）…… 127
公元 1857 年（咸丰七年　丁巳）…… 133
公元 1858 年（咸丰八年　戊午）…… 139
公元 1859 年（咸丰九年　己未）…… 144
公元 1860 年（咸丰十年　庚申）…… 153
公元 1861 年（咸丰十一年　辛酉）…… 161

第二章　同治元年至光绪十九年（1862—1893）共 32 年

引言 …… 167
公元 1862 年（同治元年　壬戌）…… 171
公元 1863 年（同治二年　癸亥）…… 176
公元 1864 年（同治三年　甲子）…… 181
公元 1865 年（同治四年　乙丑）…… 187
公元 1866 年（同治五年　丙寅）…… 193
公元 1867 年（同治六年　丁卯）…… 198
公元 1868 年（同治七年　戊辰）…… 202
公元 1869 年（同治八年　己巳）…… 208
公元 1870 年（同治九年　庚午）…… 211
公元 1871 年（同治十年　辛未）…… 215
公元 1872 年（同治十一年　壬申）…… 219
公元 1873 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225
公元 1874 年（同治十三年　甲戌）…… 232
公元 1875 年（光绪元年　乙亥）…… 239
公元 1876 年（光绪二年　丙子）…… 245
公元 1877 年（光绪三年　丁丑）…… 250
公元 1878 年（光绪四年　戊寅）…… 256
公元 1879 年（光绪五年　己卯）…… 262
公元 1880 年（光绪六年　庚辰）…… 267
公元 1881 年（光绪七年　辛巳）…… 272

公元1882年（光绪八年　壬午） …… 278
公元1883年（光绪九年　癸未） …… 283
公元1884年（光绪十年　甲申） …… 287
公元1885年（光绪十一年　乙酉） …… 294
公元1886年（光绪十二年　丙戌） …… 300
公元1887年（光绪十三年　丁亥） …… 304
公元1888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 …… 309
公元1889年（光绪十五年　己丑） …… 314
公元1890年（光绪十六年　庚寅） …… 320
公元1891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 …… 328
公元1892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 …… 334
公元1893年（光绪十九年　癸巳） …… 337

第三章　光绪二十年至宣统三年（1894—1911）共18年

引言 …… 343
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　甲午） …… 346
公元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 353
公元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 …… 361
公元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 368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 377
公元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 …… 387
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 …… 394
公元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 …… 402
公元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 409
公元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 419
公元1904年（光绪三十年　甲辰） …… 432
公元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 443
公元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 455
公元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 464
公元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 471
公元1909年（宣统元年　己酉） …… 480

公元1910年（宣统二年　庚戌） …… 487
公元1911年（宣统三年　辛亥） …… 496

人名索引 …… 511
参考文献 …… 523
后记 …… 529

总　序

纪传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两种主要体裁，而编年体的写作远较纪传体薄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小序已明确指出这一事实："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① 与古代历史著作的这种体裁格局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是纪传体一枝独秀，不仅在数量上已多到难以屈指，各大专院校所用的教材也通常是纪传体，这类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作家传记（包括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就）。编年类的著作，则虽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就总体而言，仍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现、当代部分，历时一千余年，文献浩繁，而相关成果甚少。这样一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套十八卷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出版，即旨在一定程度地改变这种状况。

文学史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纪传体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以若干个焦点（作家）为坐标，对文学史流程的把握注重大体判断。其优势在于，常能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对时代风会的描述言简意赅，达到以少许胜多许的境界。若干重要的文学史术语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大历诗风"等，就是这种学术智慧的凝

①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4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结。但是，由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个别”和“例外”（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和“例外”）往往被忽略，不免留下遗憾。一些跨时代的作家，如李煜、刘基、张岱等人，在文学史中的时代归属与其代表作的实际创作年代也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李煜被视为南唐作家，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被视为明代作家，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张岱被视为明代作家，而其代表作多写于清初。比上述情形更具普遍性的，还有下述事实：我们讲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往往以毛宗岗修订本为例；我们讲施耐庵的《水浒传》，往往以百回繁本为例；我们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往往以崇祯本为例。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讲的并不是作家的原著；第二，我们忽略了读者的接受情形。这类涉及风会与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传播与接受两方面的问题，以纪传体来解决，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往往力不从心，采用编年体，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不难依次排列，以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我们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我们的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现当代文学因时间周期较短，拟省略阶段，不设引言）。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我们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我们也酌情收入。其

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首要前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典籍，近人和今人整理出版的别集、总集，大量年谱（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以及文、史、哲方面的编年史，均在参考范围之内，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在使用上述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典籍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这一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前人已经整理的典籍，我们也并不直接采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整理一次。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确有许多好处，若干错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纠正的，有些错误的纠正涉及基本事实的澄清。比如，张大复《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记梁辰鱼晚年情形，有云："（梁氏）当除夕遇大雪，既寝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诸年少，载酒放歌，绕城一匝而后就睡。曰：'天为我辈雨玉，可令俗人蹴踏之耶?'时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恶，语不甚了。有老奴李用者，颇省其说，尚有注记。得岁七十有三。"一位学者将"中恶，语不甚了"标点为"中恶语，不甚了"，并就此推论说："梁辰鱼七十岁时遭遇暧昧不明的事件。""《皇明昆山人物传》的上述记载本意是为贤者讳，事实上倒很可能为统治者隐盖了迫害异己文人的一件罪行。"这就不免弄错了事实。"中恶"即突然患急病，正所谓"老健春寒秋后热"，老年人得急病是常见的情形。而"中恶语"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再如，陈田《明诗纪事》将正德时期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人，将两人的生平搅在一起，其按语云："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入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初与郑少谷游，晚乃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倡和，支离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诞，无所不有。少谷集中无是也。论者乃专谓山人刻意学少谷，何哉?”《明诗纪事》近三百万言，卓有建树，是研究明诗的必备案头书。但关于傅汝舟，陈田的确弄错了。郑善夫（1485—1523）号少谷，以学杜著称，学郑少谷的是正德年间的傅汝舟；文翔凤号太青，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与文太青等唱和的是明末的傅汝舟。两个傅汝舟之间相距约百年，陈田想当然地将二者合为一人，说他“享大年”，又说他前期学郑少谷，后期学竟陵派，曲意弥缝，令人哑然失笑。其他种种，如部分文学家辞典对作家生卒年的误注，若干点校本的断句错误等，我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纠正。提到这些情况，不是想证明我们的水平有多高，而意在告诉读者：我们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信赖的编年史著述。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得到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书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专家和领导，尤其是武汉大学领导的支持；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及湖南人民出版社鼎力支持编年史的编纂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陈文新

2006 年 7 月 23 日于武汉大学

凡　例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上）、第五卷隋唐五代（中）、第六卷隋唐五代（下）、第七卷宋辽金（上）、第八卷宋辽金（中）、第九卷宋辽金（下）、第十卷元代、第十一卷明前期、第十二卷明中期、第十三卷明末清初、第十四卷清前中期（上）、第十五卷清前中期（下）、第十六卷晚清、第十七卷现代、第十八卷当代。

二、编年史各卷据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为若干章（如无必要，或不分章）。章的标目方式是："××章　××年至××年，共××年"。关于某一阶段文学的总体评论放在该章的首年之前，如明前期卷"第一章　洪武元年至建文四年，共35年"，在章目下，"洪武元年"之前，单列明前期卷"引言"一目。关于某一时代文学的综合论述，放在卷首。如元代卷，在第一章前，单列元代文学"绪论"。

三、编年史各卷所收录内容的构架大体统一，重点包括七个方面：1. 重要文化政策；2. 对文学发展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3. 作家交往（唱和、社团活动等）；4. 作家生平事迹；5. 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6. 争鸣（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论辩等）；7. 其他。

四、叙事以纲带目，即在征引相关文献之前有一句或数句概述。如，先总叙一句"俞宪编《盛明百家诗》成书"，再征引相关序跋、著录、评议。前者为纲，后者为目，纲、目配合，旨在完整地呈现文学史事实。少量见于常用工具书的重要史实，或不必展开的文学史事实，则列纲而略目，以省篇幅。

五、公历纪年年初与中国传统纪年年末不属同一年份，如公元1899年元月1日至12月31日对应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九日，而不对应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我们采用变通的处理方法，以公历纪年，而以农历纪月，比如，凡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至十二月之内的内容均置于公元1899年下。作家生卒年，仍据公历标注，其他以此类推。现、当代文学部分，纪年、纪月均据公历。

六、同一年内之文学史实，按月份先后顺序排列。月份不详而仅知季度的，春季置于三月之后，夏季置于六月之后，其他以此类推。季度、月份均不详者，另设“本年”目统之。

七、一部分重要文学史实，年月不详而仅知大体时段者，在年号之末另设“××年间”目统之，如嘉靖四十五年之后另设“嘉靖年间”一目。

八、引用序跋，一般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臧懋循《唐诗所序》”。引用序跋之外的诗文等作品，一般采用“集名+卷次+篇名”的方式，如“《有学集》卷三一《隐湖毛君墓志铭》”，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无篇名者则省略，如“《艺苑卮言》卷三”。某作者集中所收为他人别集所作的序跋，亦采用这一方式，如“《太函集》卷二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序》”。引用正史，一般采用“正史名+本传或××传”的方式，“如《明史》本传”或“《明史》李攀龙传”，不标卷次。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用全称，或简称“四库提要”，只标明卷次。如“四库提要卷一五三”。引用地方志，标明纂修年代，如“光绪《乌程县志》卷三一”。据类书转引时，注明原出处，如“《太平广记》卷二〇《阴隐客》（出《博异志》）”。引用报刊，注明年月日或卷次。

九、作者小传一般置于生年。有些作家，虽生年在上一卷，但在上一卷无文学活动，其小传酌情移入本卷首次出现时。如杨士奇，元亡时才4岁，其小传置于明前期卷，出生时只交代：“杨士奇（1365—1444）生”，不列小传。现、当代作者，因传记资料常见，相关作家小传酌情收录。

十、对于某一作家的总体评论和重要著录一般置于卒年。某作者卒年在下一卷，但在下一卷无重要文学活动，主要评论材料酌情置于本卷。如易顺鼎（1858—1920），其评论材料集中于晚清卷，不入现代卷。

十一、作家代表作一般不录原文，但收录重要评论材料，并酌情说明相关选本收录情形。

十二、需要补充交待而占用篇幅较大的文学史事实，设少量“附录”。对若干需要辨证的史实，设按语加以说明。以提供文献线索为主，不详加征引。

绪 论

《清史稿·宣宗本纪三》：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国步之颠，肇端于此。呜呼，悕矣！

《清史稿·邦交志一》：中国古重邦交。有清盛时，诸国朝聘，皆与以礼。自海道大通而后，局势乃一变。其始葡萄牙、和兰诸国，假一席之地，迁居贸易，来往粤东；英、法、美、德诸大国连袂偕来，鳞萃羽集，其意亦仅求通市而已。洎乎道光己亥，禁烟衅起，仓猝受盟，于是畀英以香港，开五口通商。嗣后法兰西、美利坚、瑞典、那威相继立约，而德意志、和兰、日斯巴尼亚、义大里、奥斯马加、葡萄牙、比利时均援英、法之例，订约通商，海疆自此多事矣。俄罗斯订约在康熙二十八年，较诸国最先，日本订约在同治九年，较诸国最后。中国逼处强邻，受祸尤烈。……咸丰庚申之役，联军入都，乘舆出狩，其时英、法互起要求，当事诸臣不敢易其一字，讲成增约，其患日深。至光绪甲午马关之约，丧师割地，忍辱行成，而列强据利益均沾之例，乘机攘索，险要尽失。其尤甚者，则定有某地不得让与他国之条，直以中国土疆视为己有，辱莫大焉。庚子一役，两宫播迁，八国连师，势益不支，其不亡者幸耳。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清学）其蜕分期运动之代表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也。当正统派全盛时，学者以专经为尚，于是有庄存与，始治《春秋公羊传》有心得，而刘逢禄、龚自珍最能传其学。《公羊传》者，“今文学”也。……（清学）今古文之争起，互相诋谌，缺点益暴露。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其命运自不能以复久延。……道咸以后，清学曷为而分裂耶？其原因，有发于本学派之自身者，有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鸦片战争”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

丁福保《畴隐居士学术史》：有清一代，为许、郑之学者，以江浙为最盛。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宋翔凤，倡为今文之学，摭拾西汉残缺之文，欲与许、郑争席。至康有为、廖平之徒，肆其邪说，经学晦盲而清室亦因之而屋焉。追原祸始，至今于龚、魏，犹有余痛。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道咸以降，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如龚璱人、魏默深之俦，其学在道咸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摄，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

《清史稿·选举志三》：清代名臣多由科目出身，无不工制义者。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康熙后益轨于正，李光地、韩菼为之宗。桐城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允称极则。雍、乾间，作者辈出，律日精而法益备。陵夷至嘉、道而后，国运渐替，士习日漓，而文体亦益衰薄。至末世而剿袭庸滥，制义遂为人诟病矣。

《清史稿·艺文志一》：（康乾之世）其宋、元精椠，多储内府，天禄琳琅，备详宫史。经籍既盛，学术斯昌，文治之隆，汉、唐以来所未逮也。各省先后进书，约及万种，阮元既补四库未收书四百五十四种，复刊经解一千四百十二卷，王先谦又刊续经解一千三百十五卷，而各省督抚，广修方志，郡邑典章，粲然大备。其后曾国藩倡设金陵、苏州、扬州、杭州、武昌官书局，张之洞设广雅书局，延聘儒雅，校刊群籍，私家亦辑刻日多，丛书之富，曩代莫京。及至晚近，欧风东渐，竞译西书，道艺并重。而敦煌写经，殷墟龟甲，奇书秘宝，考古所资，其有裨于学术者尤多，实集古今未有之盛焉。

《清史稿·文苑传一》：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论者至欲特立“清学”之名，而文、学并重，亦足于汉、唐、宋、明以外别树一宗，呜呼盛已！……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圣主贤臣，莫不以提倡文化为己任。师儒崛起，尤盛一时。自王、朱以及方、恽，各擅其胜。文运盛衰，实通世运。此当举其全体，若必执一人一地言之，转失之隘，岂定论哉？道、咸多故，文体日变。龚、魏之徒，乘时立说。同治中兴，文风又起。曾国藩立言有体，济以德功，实集其大成。光、宣以后，支离庞杂，不足言文久矣。

胡薀玉《中国文学史序》：自（满洲）入关迄于逊位，二百六十余年，文学递变，分为四期……道、咸之世，桐城之文，风靡一时，一传而为阳湖、金陵，再传而为湘、赣、西粤。及其末流，以空义相演，以摹仿擅长，于是常州人士，倡言西汉今文之学，杂采谶纬之书，旁及曲词之音，故多新奇诡异之辞，绵邈哀思之作。方耕、申受，为此派之开宗；定盦、默深，为此派之巨子。此第三期也。近岁以来，作者咸师龚、魏，放言倡论，冒为经世之谈；袭貌遗神，流为偏僻之论。文学之衰，至于极地。日本文法，因以输入；始也译书撰报，以存其真；继也厌故喜新，竞摹其体。甚至公牍文报，亦效东籍之冗芜；遂至小子后生，莫识先贤之文派。此第四期也。呜呼！文学至第四期，遂无复文法之可言，更三数十年，其浅陋空疏，尚可问耶？观往时之盛，抚今日

之衰，不独文字之感，亦多世运之悲矣。

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专家之学，主张后进。海峰承之，遗风遂衍。姚惜抱氏禀其师传，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阃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百余年来，转相传述，遍于东南；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以数十计。呜呼！何其盛也！……道光末，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梅郎中、曾文正之伦，相与修道立教，惜抱遗绪，赖以不坠。逮粤寇肇乱，祸延海宇，文物荡尽，人士流徙，展转至今，困犹未苏。京师首善之区，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诸老，声气冥合，箫管翕鸣，邈然不可复得。而况山陬海澨，弇陋寡畴，有志之士，生于其间，谁与祓濯而振起之乎？观于学术盛衰升降之源，岂非有心世道君子责也？

黄人《清文汇序》：康、雍之文醇而肆，乾、嘉之文博而精，与古为新，无美不具，盖如日星之中，得春夏之气者焉。道、咸两朝，争桑弄兵，四寓多故，男儿作健，志士苦心，被褐而来，弃缊而去，击楫者有澄清之志，浮查者多凿空之谈，劬古并治钤符，著书旁通鞮译。儒生专阃，成韩、范之勋；记室多才，得琳、粲之亚。至若贾生恸哭，杜牧罪言，尤在在皆是。故其文激昂峭厉，纵横排奡：忠义之骨，而参以仙侠之心；骚雅之音，而出以幽、并之气。中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灌输脑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故其文光怪瑰轶，汪洋恣肆，如披《王会》之图，如观楚庙之壁，如登喜马拉山绝顶，遘天帝释与阿修罗鏖战，不可方物。极此以往，四海同文之盛，期当不远。

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顺、康之文，大抵以纵横文浅陋，制科诸公，博览唐、宋以下之书，故为文稍趋于实。及乾、嘉之际，通儒辈出，多不复措意于文，由是文章日趋于朴拙，不复发于性情，然文章之征实，莫盛于此时。特文以征实为最难，故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富于才藻者，则又日流于奇诡，此近世文体变迁之大略也。近岁以来，作文者多师龚、魏，则以文不中律，便于放言，然袭其貌而遗其神。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其始也，译书撰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夫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之可言，乃时势所趋，相习成风，而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谓非中国文学之厄欤？

李详《论桐城派》：乾隆中程鱼门与姚姬传先生相习，谓“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此乃一时兴到之言……然鱼门之言，乾、嘉时尚无敢奉此为说，以当时诸老，存者犹夥，略一举口，则诘难蜂起，故匿而不见。至道光中叶以后，姬传弟子，仅梅伯言郎中一人，同时好为古文者，群尊郎中为师，姚氏之薪火，于是烈焉。复有朱伯韩、龙翰臣、王定甫、曾文正、冯鲁川、邵位西、余小坡之徒，相与附丽，俪然各有一桐城派在其胸中。伯言亦遂抗颜居之不疑。逮曾文正为《欧阳生文集序》，复畅明此旨，昭昭然若揭日月。文正功勋莫二，又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不知文正此序，乃借为文章波澜，不意举世尊之若此。惟巴陵吴氏具有先见，作书与文正，力自剖别。文正即答书，许其摘免，虽为相戏之言，其情固输服矣。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